

让我们越来越接近历史真相

◎ 杨奎松 著

西安事变新探

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 杨奎松 著

西安事变新探

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203-07593-6

I. ①西… II. ①杨… III. ①西安事变—研究
IV. ①K264. 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4601 号

西安事变新探

著 者: 杨奎松
责任编辑: 蒙莉莉
装帧设计: 老陆工作室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 本: 787 mm×1092 mm 1/32
印 张: 29.25
字 数: 408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版 次: 2012 年 3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7593-6
定 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蒋 序

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将军，发动事变的原因为何？或其事变前与中共之关系如何？为何终于演成“劫蒋”的一幕？过去的研究或著作，多以有关人士的回忆录及一些公开的文件为其重要资料的依据；特别是张氏本人的回忆录（一般通称《西安事变忏悔录》）。因此，对此事变有些问题的解释，往往受到一些回忆录的影响。

近年由于大陆方面档案资料的刊布和利用，以及在台私人遗留日记的公开，使吾人对此事变的原因及其过程的曲折变化，渐有新的了解。一年以前，笔者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陈三井先生之约，为该所集刊纪念郭廷以先生九十冥寿专号撰有《张学良、周恩来延安会谈与西安事变之前因》一文，利用了上述一些资料。认为张学良自延安会谈（1936年4月9日）后，随着中共统战策略的演变，由“抗日反蒋”而至“逼蒋抗日”，终至演成西安事变（即“劫蒋”）。此一观点的由来，起于1997年7月在《传记文学》发表的《有关西安事变的新资料》一文，介绍杨奎松新著《“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出版），及《徐永昌日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出版）中有关西安事变的新资料。

在笔者对西安事变的新资料继续追求中，深感上述张、周“延安会谈”一文仍多有缺失须补充和修正。适因去年（1994年）国民党创党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提出《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中共之关系》一文，借以补正前文之缺失。本文撰写期间，复承杨奎松先生以其

最近新著《西安事变新探》稿相示，并嘱为撰序。笔者有幸，得以先睹杨先生的原稿，认为此一新著不仅运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而有新的发现，同时对于西安事变若干史实作了新的探索。书名定为《西安事变新探》可谓名副其实。

极为难得的是，杨先生允许笔者引用其新著稿中一些珍贵资料，对拙稿《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中共之关系》的补充，助益良多。笔者谨以此文的提要，权充杨先生新著的“代序”，用是“以文会友”，非敢掠美也。

拙稿《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中共之关系》的要旨在说明大陆方面近年有关西安事变档案资料的刊布和利用之概况，并举张学良、周恩来两当事人对其延安会谈内容的陈述作对比，以示回忆录与档案资料的差异。次就张与中共代表李克农洛川会谈的协议及其未能解决之歧见，因有延安会谈的举行，略有说明。在双方满意的情况下，使张由原来主张“拥蒋”而迈向中共的“抗日反蒋”之路，加以张之“抗日”情切，在中共的“俄援”与“西北大联合”的引诱下，使张决心追随中共“拼干”下去，甚至要求加入中共，但受到共产国际的批驳。盖莫斯科方面所需求的，显为中国全国性的“抗日”力量，因有“联蒋（介石）弃张（学良）”之指示。中共则以“务实”的作法，一面与南京方面进行谈判，一面继续联络“各派反蒋军阀”，以“双管齐下”之法，来“逼蒋抗日”。如此，张与杨虎城等不仅成为中共与南京谈判的筹码，也就成了“逼蒋抗日”的追随者。

蒋既不愿对共妥协，张亦走上“逼蒋”的不归路，两人之间势成骑虎。其最后结局，只是决裂的方式之选择而已。结果张却采取了兵变的方式，发动了西安事变。此为笔者读杨奎松先生新著稿之后，对西安事变原因的一点看法。

蒋永敬

1995年5月于政治大学

大陆版代序

张学良入党之谜

十五年前，当我在《“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中，首次披露张学良曾要求加入中共的问题时，在大陆几乎没有引起过任何特别的关注。一半是因为发行上的原因，一半是因为那个时候气氛有些异样，因此，除了茅海建教授那样对传统的党史说法有颇多疑问的少数学者以外，很少有人注意到那样一本突出强调中国革命外部原因的书。这本书被人重视，反倒是因为蒋永敬教授，他专门写了一篇书评，发表在《传记文学》杂志上。不过，蒋教授是台湾国民党史研究的专家，他重视这本书，其实也不是因为他关心我对中共党史有着怎样新的说法，而是对书中谈到西安事变前张学良试图加入中共，并通过中共接通苏联，发动“西北大联合”的情况深感兴趣。因此，他尽管评的是我的《“中间地带”的革命》，用的标题却是《有关西安事变的新资料》。不仅如此，蒋教授还极力推动并鼓励我把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内幕具体地写出来。由此也就有了1995年我在台湾出版的《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一书。

相信凡是对西安事变史研究多少有些了解的读者都知道，在1995年之前，无论是大陆还是海外的西安事变研究，都很少具体讨论到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中共和苏联在西安事变发生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问题。这并不是大家对此不感兴趣，没

有人不知道张学良与周恩来有过延安会谈，也没有人不知道西安事变一发生，中共代表周恩来就亲赴西安，直接参与了张学良、杨虎城与代表蒋介石的宋美龄、宋子文之间的谈判过程，以及莫斯科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问题上可能发生过作用。很多年来，面对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与大陆公布的周恩来在事变期间打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的不同说法，人们也都在猜测：究竟在事变期间，在蒋介石和周恩来之间发生过什么，他们两人的说法谁的更真实一些？而读过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的读者，也会或多或少地对事变前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问题，发生强烈的兴趣。然而，因为缺乏足够的研究资料，这一切谜团都无从解答。不仅如此，大陆的学者中间甚至还逐渐开始流行起一种说法，即认为中共不仅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毫无作用，就是当时中共自身的政策，也还是受着张学良影响呢。

不用说，《西安事变新探》一书的出版，全面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人们从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西安事变之前，在事变期间，以至在事变善后的过程中，张学良和中共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共对于整个事变起过怎样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身为十几万东北军统帅，深得蒋介石器重的张学良，何以会冒险与自身尚处于极度危险中，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几万红军暗通款曲，甚至于把宝押在中共身上？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复杂的内幕？自然，这本书也首次全面披露了中俄两国档案中仅存的有关张学良要求入党问题的几份珍贵的档案文献，并且结合相关史料，具体地介绍了张学良提出入党要求的经过，和中共中央及共产国际所做出的不同反应。仅此，已足以否定那种关于中共对于西安事变几乎不起作用的说法。

但是，让笔者意料不到的是，随着张学良先生去世，大陆报纸杂志乃至网络上却突然刮起一股旋风，将过去那种否定中共作用的说法刮得无影无踪。人们迅速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转而热衷于谈论这样一个惊人的话题：原来“张学良是中共党员”!! 由于从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到张学良研究专家张友坤等，先后都

出来撰文作证^[1]，再加上个别纪实文学作家的渲染炒作，此种说法一时间似乎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而海外一些华文报刊和网站也据此纷纷发表评论，宣称：“历史即将改写！”以往按照大陆史观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一些基本看法和观点，“会发生根本的动摇和改变”。因为，张学良既然是中共党员，那么理所当然西安事变是中共在幕后主导。中共既然推动并主导了事变，自然也就应当与张同进退。然而，当张学良按照与中共的约定发动了事变之后，中共却迫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压力改变了对张所做出的一系列承诺，把张晾了起来。如此才造成张一气之下不辞而别，只身陪蒋介石回南京以领罪，进而惨遭蒋介石软禁半个多世纪的可悲结果。^[2]

问题是，能够确定地说，张学良是中共党员吗？

关于张学良是中共党员的最权威的说法，来自于阎明复，张友坤的证词实际上亦来自于阎的说法。而阎明复的这一说法，又来自于另外两人。一为前东北军将领，后来成为中共将领的吕正操。据阎回忆，他受命参加了张学良的葬礼之后去看望同样年事已高的吕正操，是吕说了一句：“张汉公是共产党员。”一为前东北籍大学生，后主持过东北军史整理编辑工作的宋黎。据他回忆，宋黎说过，当年宋曾特别就此问题请教过西安事变前和西安事变期间曾经代表中共中央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叶剑英，说“叶帅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宋说他已把叶帅谈话内容记录下来，装进保险箱，准备死后再拿出来交给中共中央。但是，阎的回忆文章也明显地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他说他在1995年夏天去过苏共档案馆，偶然发现了1936年12月初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一份电报，电文内容就是关于中共应该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里去扩大自己的队伍，而不应当靠吸收军阀入党来发展党。他紧接着强调：“以后的事态表

[1] 阎明复：《忆宋叔》，转见张友坤：《张学良的党籍问题》，《北京日报》，2002年12月22日。

[2] 《历史即将改写！张学良是中共党员》，《人民报消息》，2005年10月20日。（<http://www.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05/10/20/38018.html>）

明，尽管共产国际明确表示反对张学良入党，中共中央仍决定发展他入党。”在这里，阎所“发现”的电文内容，与莫斯科1936年就已经公开的共产国际1936年8月15日政治指示电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共产国际是否在12月初又再度就此致电中共中央颇让人怀疑，会不会阎“发现”的就是8月15日政治指示电？而其后所谓“以后的事态表明”如何如何，逻辑上更不能成立。因为，共产国际8月15日政治指示电已经明确否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希望吸收张学良入党的提议，如果中共中央真有“仍决定发展他入党”的措施，也应当是在8月政治指示电达到之后，而断不致拖到12月初共产国际再来电报反对之后再采取。何况，此时距离西安事变的发生不过几天时间，叶剑英等有资格将此一决定告知张学良的中共代表也不在西安，如何实现此一“发展”？当然，阎文对于中共中央是否真的发展了张学良，也不能肯定。他的说法是：“现在不清楚的是，中共中央吸收张学良入党的决定，有没有通知张学良本人？叶帅同宋黎的谈话记录将会揭开这个‘谜’。”

寄希望于当事人之一的叶帅的回忆，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第一，现在还没有人看到过宋黎的这一记录；第二，我们也很难确保宋黎的转述不会与叶帅叙述的原意有所出入；第三，就证据而言，任何回忆，更不要说经过了几十年的回忆都必须要有相关的文献资料加以印证才比较可靠，而目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俄国，仅存的三件可以反映张学良入党问题的文献资料，都还不能支持上述说法。1936年6月30日刘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只提到张学良要求加入中共；7月2日洛甫代表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也只提到我们“将来拟许其入党”；8月15日共产国际政治指示电，也只是说明：对“你们关于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我们感到特别不安”，强调“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成是可靠的盟友”等。

有学者说，在共产国际回电之前，张学良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已有电报开始以“同志”相称，由此可以看出双方关系已进到组织关系的程度，这种说法更不能成立。不错，7月3日张学良有信称周恩

来为“同志”，强调此间必须有6个月准备工夫；8月9日毛泽东等也有信称张学良为“同志”，并肯定“八个月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但以“同志”相称，即使在当时也并非就是共产党人之间的一种专利，它充其量只能表明双方之间进一步的信任。何况，双方之间的来往信件，直到西安事变，更多的也还是在使用“兄”的称呼。这和共产党人之间内部通信的习惯也不尽相合。

有位作家推测说，共产国际回电距离中共中央决定吸收张学良入党的7月1日，已过去一个半月。这一个半月里，张学良与中共中央联系密切，商量了许多大事。因此，以当时的境况，是不可能拖到一个半月后再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去答复张学良的，也不可能作决定让张学良入党之后，又劝其退党。因此，他的结论是，张学良肯定已经被正式发展入党。^[1]此说显然不仅读丢了张闻天7月2日电中那个“拟”字，而且对7—8月间张学良与中共中央之间关系复杂微妙的情况毫无了解。而更重要的在于，他甚至不清楚当时中共中央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张学良发生关系的。他不知道，吸收张学良入党问题高度机密，断难通过电报转达，非有专人前往西安向张学良传达中共中央的正式决定并履行适当的形式不可。此时，唯一得到中央指派准备前往西安且能够担此重任者，只有叶剑英，而叶却直到10月初才得以到达西安。至于说张6月30日提出要求入党，7月3日就获知中共决定，然后即对中共领导人改称“同志”，在时间上也说不通。这更足以说明，“同志”之称不可以用来证明张与中共的组织关系。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呢？即中共中央于7月2日告诉共产国际，他们尚未正式决定吸收张学良入党，但“将来拟许其入党”；而事实上，他们已经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有意接受张学良入党；只是因为张的身份太过特殊，为稳妥起见，才对共产国际把话说得比较

[1] 陈益南：《评述“西安事变”中若干鲜为人知的细节》（见 <http://www.xtour.cn/2005-6/200561594940.htm>）。

委婉，以试探后者的反应。毫无疑问，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甚至，我们也可以猜测，因为叶剑英还不具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的资格，共产国际来电前，他已受命前往西安，已经了解了中共中央 对此事的态度，然而中共中央在接到共产国际政治指示电后，因为 担心拒绝吸收张学良入党可能对红军与东北军的统战关系造成十分不 利的后果，故未能就拒绝吸收张学良入党问题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 叶因此在由陕北动身前往西安时也并未得到确切的拒绝吸收张学良入 党的指示。就我而言，我相信这种可能性未必一定是不存在的。但问 题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即由于共产国际 是中共中央的上级指导机关，且这时的中共中央和红军要想根本改 变自身危险处境和取得苏联援助，也必须要指望共产国际的支持与 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当共产国际明确表态反对吸收张学良入党时， 以留苏学生为主的中共中央领导层很难阳奉阴违，抗命不遵，擅自 秘密接受张学良入党。可为有力佐证的如中共中央此后发展新疆统 治者盛世才的例子。与张学良不同的是，盛世才因为治疆以来即奉 行亲苏政策，一直颇得苏方好感。故当其向中共中央提出入党要求 时，中共中央自然认为莫斯科同意的可能性较大，故准备接受盛世 才的要求。不意，在征求共产国际意见时，共产国际同样表示反对。 尽管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此并不十分理解，他们还是派任弼时当面向 盛世才婉转地表示了拒绝的态度。

当然，不论张学良入党问题之谜能否彻底揭开，我都不认为 “历史即将改写” 的说法可以成立。这是因为，即使中共中央具体实 施了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行动，张学良也得知了这一决定，它也不能 改变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实质。即张学良至多不过是一个所谓的 “特殊党员”，而非一般意义的共产党员。换言之，两者无论就政治 标准、思想意识、组织关系，还是就相互地位而言，其实与决定吸 收张学良入党前，都没有也不可能有重要的改变。事实上，西安事 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依旧采取的是毛泽东 2 月间“依据实力原则” 提出的，一旦双方共同行动，“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

张汉卿担任”的方针，公开奉行以张为首的政策。在整个西安事变策划和实行的过程中，张学良也依旧是我行我素，一切以自我的意志行事，并不受中共中央的指挥。这也正是为什么，当事变结束，张学良被囚之后，尽管身陷囹圄，命运未卜，他第一位考虑的仍旧是东北军的前途问题，生恐东北军继续与红军保持统战关系，会造成难以预测的严重后果。故他明确建议蒋介石把东北军尽快调离陕甘地区，脱离中共与红军。由上不难了解，不论是从中共中央的角度，还是从张学良的角度，张学良入党与否，都不可能改变这一时期双方关系的本质。

至于此说是否能够言之成理，相信读过本书之后，读者自会得出自己的答案来的。

杨奎松

2006年4月29日

于日本京都大学国际交流会馆

前 言

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多半是在1980年，至迟不超过1981年，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使我有幸在一位同学那里看到了一些有关西安事变的相当珍贵的文献资料。其中的几件资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就是1936年4月27日和30日刘鼎给李克农的报告，以及5月初朱理治和曾钟圣两人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这几件资料清楚地表明，还在1936年4月底5月初，张学良就已经开始做反蒋的准备了。不过，那个时候西安事变对于我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课题，这些资料还不可能使我对研究西安事变发生兴趣。

毕业以后，由于从事编辑工作的关系，我开始较多地接触到近代历史的研究成果，其中自然也包括西安事变的研究。像吴天威先生的《中国现代历史的转折点》，申伯纯先生的《西安事变纪实》，李云峰先生的《西安事变史实》，乃至李云汉先生的《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等，大致都是在1980年代中期陆续拜读的。使我感到好生奇怪的是，包括海外的著作在内，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在谈到张学良与周恩来那次颇为著名的延安会谈时，都一口咬定：张学良当时力主“联蒋抗日”（或称“逼蒋抗日”），并且说得周恩来口服心服，最后就连中共中央也确信张学良是对的，因此在延安会谈结束后不久，即4月底5月初，中共就改行了“逼蒋抗日”的策略。

同是一个4月底5月初，我们的研究者们竟得出了如此不同的结论！

也许，这些西安事变的研究者都没有看到我几年前就已经看到

的那几件资料？1987年，我试着帮助两位同事利用有关的资料写了一篇论文，刊登在1988年《近代史研究》第三期上，对上述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也许是人微言轻，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总之这篇文章没有引起多少反应，唯一一位提到这篇文章的学者，还在他的论文里把这个观点好好地批评了一通。可想而知，在1989、1990、1991年西安事变研究硕果累累的几年里，我们众多的研究者们照旧人云亦云，把过去那个说法抄来抄去。但最让我惊讶的，还是刘鼎先生自己：他竟然也支持这样的说法！

刘鼎先生的说法公开发表在1989年。这一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党的文献》杂志连载了一篇题为《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的长文。传主刘鼎1936年西安事变期间始终作为中共联络员驻在张学良身边，并且亲身参加过延安会谈等一系列当时发生在张学良与中共之间的重大事件，以后并作过全国政协西安事变史写作组的组长。这篇文章的基本资料，恰恰就是刘鼎先生自己在1975年所做的追忆笔记。而介绍刘鼎这段经历的这篇文章的作者，又是继刘鼎之后担任过西安事变史写作组组长，在西安事变研究上颇有成就的张魁堂先生。其分量可见一斑。

既然是刘鼎先生自己所做的追忆笔记，按道理刘鼎先生应当对当时事情的大致经过有所记忆，更应当记得自己当年所写的报告。即使是忘了，他也应该看过留存下来的那几份已经不再神秘的历史资料。可是，在这篇文章中，或者毋宁说在刘鼎的笔记里，不仅对于他自己当年的密报及当时朱理治、曾钟圣两人的电报内容一句也没有提到，而且竟然也人云亦云地大谈张学良在延安是怎样说服周恩来赞成联蒋抗日的。文章中居然把周恩来在延安会谈后写给张学良的信里的一句主张反蒋的话，即“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也说成是中共“主张有条件联蒋”的表示。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刘鼎先生的回忆并不否认张学良曾经有过准备反蒋的事实，可是，照文章中所记，这段史实被安排到1936年7月去了。结果事情的经过就变成了一个怪圈：即在4月间延安会谈期间刚刚劝说中共联蒋的张学良转而反蒋，而刚刚在延安会谈时劝说张学良反

蒋的中共中央，这时却又倒过来劝说张学良应当联蒋。呜呼哀哉！堂堂当事人，又是西安事变史写作组的组长都这样记述历史，难怪在此之后陆续出版的《西安事变简史》、《东北军传》、《张学良将军传略》、《张学良传》，包括海外学者所作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也都异口同声地如此说。但是，我相信，这不是事实。

在以往的西安事变研究中，究竟还有多少这种不是事实，或者似是而非的说法呢？有一位资深的张学良问题研究专家明确地告诉我，有关西安事变的基本史实都已经写清楚了。言外之意，在有了如此之多的研究成果，而众多成果已经大同小异的情况下，重新再来系统讨论西安变变的史实经过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可是，时至今日，在我仔细地研究过有关的著作之后，我发觉，尽管不少关心西安事变历史的人同意这样的看法，即西安事变的发生同中国共产党有关系，但却没有一本书对中共与西安事变，或者说与张学良的关系问题做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甚至，当许多读者从近几年公开发表的报纸杂志上已经知道张学良曾经有过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但却很少有人进一步就此提出疑问：那个打算加入共产党的张学良，与我们通常在西安事变史书上所看到的那个力主联蒋抗日的张学良之间，是否存在着矛盾？当然，尽管这些年来人们已经听说了太多的有关“西北国防政府”、“西北抗日联军”、“西北大联合”……这些曾经风行于当年大西北的明显地带有反蒋色彩的政治词汇，可是又有谁具体地研究过它们同张学良，特别是同西安事变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呢？

有关西安事变的研究无疑已经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但是，说以往的研究已经完全解开了西安事变留存于人们心中的种种谜团，怕是言过其实。自张学良先生完全实现了人身自由之后，新闻界以及历史学界之所以频频重提西安事变的问题，正好说明了有关西安事变还有许多疑问没有解决。至少，在笔者看来，在西安事变研究当中，一个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关于张学良与中共关系问题还没有深入地进行研究。而前此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更多的还只是围绕着张学良个人经历以及他和东北军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形成过程来

进行的，多数研究者只是用很少的篇幅来描写有关张学良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而且这些描写往往还是简单地建立在诸多当事人真假难辨的回忆录的基础上的。

西安事变研究的一个重要优势就在于它的回忆史料十分丰富。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大概还没有哪一次事件有过像西安事变这么多的回忆资料。但多半也正因为如此，过多地依靠回忆史料来描述史实，也成了西安事变研究中的一个十分明显的缺陷。翻开有关西安事变史的著作，把回忆录当成判断史实唯一根据的情况可以说司空见惯。回忆录（或者用时髦的字眼儿：口述历史）与第一手的文献资料相比，有其特殊的功用。其最大优点，就在于它比文字档案资料更具有直观性，可以提供独特的个人视角，告诉人们那些发生在文献资料背后的东西，给人以较强的立体感。但人所共知，如果回忆资料没有当事时的日记、笔记或文献作为依据，它们通常并不是那么很可靠的。而在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回忆录中，又有多少是以当年的日记、笔记或文献为依据的呢？甚至，即使是对那些有足够的历史文献可供参考的众多当事人来讲，由于几十年之后种种因素的影响，他们回忆中的许多事情也难免走样。像刘鼎先生关于延安会谈内容的回忆，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显而易见，如果我们的研究多半只是建立在众多这些回忆的基础上，而不是更多地依靠第一手的历史文献，由此得出的许多说法必然是大可怀疑的。

当然，以前的研究者之所以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回忆材料来进行有关西安事变的研究，确曾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记得在十二年前（1983年），当时我刚刚开始做编辑，我的上司曾经提示过我有关的宣传纪律，其中就包括西安事变的问题。据说此前上面曾经就西安事变问题的宣传与研究打过招呼，提醒有关部门在发表涉及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文章时，要注意到张学良先生还没有恢复自由的情况，不要给张学良先生带来意外的麻烦。因此，在张学良先生恢复自由之前，我们曾经很小心地回避那些在西安事变研究上有任何新的说法的文章。但事实上，还在1985年以后，这种情况就已经发生了很

大的改变。

从1985年《文献和研究》公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关于‘联蒋抗日’方针的一组文电”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一组文电”开始，直到1994年《毛泽东文集》（第一、二卷）和《毛泽东年谱》相继出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陆续公布了大批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历史文献。被公布的文献不仅涉及中共中央这一时期的策略方针的演变、国共两党秘密接触谈判、红军打通国际路线问题、西北大联合计划、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以及与张、杨谈判交涉（包括张学良与李克农的洛川会谈、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延安会谈以及杨虎城与张文彬的西安会谈等）的大量报告，而且还包括了西安事变发生期间中共中央与西安中共代表周恩来及张学良之间的各种来往电报。在这些文献中间，有些资料在过去无疑是属于高度保密的。比如像关于张学良要求入党及被共产国际拒绝的文件；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期间曾经主张一旦西安被围，就应对蒋“行最后手段”，张学良也表示赞同的电报；以及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期间讨论如何处置蒋介石的会议记录和共产国际电报指示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共历史档案公布得最多的，正是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前后这段时期的档案。粗略计算下来，光是这一年前后的文件，至少就公布了近两百件之多。这还不算那些尚未正式公开，但已经在有关论文中直接引用的数量更多的与西安事变相关的文件。

事实昭然，如果说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我们的研究者还没有足够的条件利用第一手的文献资料研究西安事变，这也许不错。但如果说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的研究者还没有足够的条件利用第一手的文献资料来研究西安事变，那就大谬不然了。可是，令人十分不解的是，即使在张学良先生已经完全恢复自由多年之后，我们至今还是看不到这样的研究著作，它更多地利用的是这些已经公开或半公开的文件，而不是那些明显地不那么可靠的回忆录。

也许，有些研究者会解释说，所有这些档案文献的公布当时还只是“内部”的。但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太多的区别。不要说这些所